

西风译丛

培根论人生

〔英〕培根著 王义国译

培根论人生



光明日报出版社

过 阅 读 的 生 活

培根论人生
西
风
译
丛

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英」培根／著
王义国／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培根论人生/(英)培根(Bacon, F.)著;王义国译.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12

(西风译丛·第2辑)

ISBN 7-80206-376-0

I. 培... II. ①培... ②王... III. 培根, F.
(1561~1626)—人生哲学—文集 IV. B56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234 号

书 名:培根论人生

著 者:[英]培根

译 者:王义国

责任编辑:高 迟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责任印制:胡 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06-376-0

定 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培根 (1561~1626年) :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作家、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从政，历任国会议员、国王顾问、大法官等要职。主要著作有《伟大的复兴》《政治和伦理论文集》。

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鸣锣开道者。他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友谊责任论》

《如何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

《思想录》

· a · 《梦的解析》

《理想国》 《孤独散步者的遐思》

《先知》 《培根论人生》

《我不愿树立雕像》

《自卑与超越》

《爱的艺术》

《君王论》

《爱与生的苦恼》

《论国民与国家的财富》

《论和谐生活的准则》

《宽容》



责任编辑：高迟

装帧设计：合利工作室 | JOY+ LULU |



▪
▪

译 序

▪
▪
▪

本书翻译所依据的版本，是欧内斯特·里斯（Ernest Rhys）所编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版。万人丛书版是公认的权威版本，这个版本又附有奥利芬特·斯米顿（Oliphant Smeaton）所撰写的长篇“导论”，公认是对培根的权威性论著，是学习或者研究培根的必读论著。斯米顿的导论对培根的生平、学术成就以及这本《论说文集》本身作了十分系统详尽的论述，读者读了之后自会对所论的作者和作品有一个明晰的概念，所以这篇译序也就没有必要面面俱到，而拟着重谈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首先，我在翻译过程中，经常由衷地慨叹，前辈中外学者

为了人类的学术积累，竟付出了如此多的辛勤劳动。里斯的万人丛书版，除附有斯米顿的权威性导论外，还附有“引用语和外来语索引”（Index of Quotations and Foreign Words, with translation）和“注释词表”（Glossary），前者对本书中所使用的拉丁文引语等作了英文释义，有的还注明引语出处，后者则对本书的难字或者古今词义不同的字作了解释。若没有这两个“工具”的帮助，欲读懂培根的文章，谈何容易。

除万人丛书版之外，我还参考了J·麦克斯·帕特里克（J. Max Patrick）编的《弗朗西斯·培根论说文选》（Selected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美国AHM出版公司1948年版）。这个选本收入了全书58篇文章中的51篇，外加一篇文章的未完稿。这个选本是编者帕特里克对培根的论说文的研究成果，由于是选本，所以注释也就尤见详尽。在每一页的脚注中，除了对引用语和外来语作出考证和解释、对有关词汇进行解释之外，还对某些难句作了释义，也就是所谓的paraphrase。我在高校英文系执教30多年，深知paraphrase在理解原文的意义上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Paraphrase，在语言教学上，就是“变换措辞”，也就是用别的话说同一件事情。这包括着词义的选择，须知英语一词多义，选择上如果“差之毫厘”，理解上就有可能“谬以千里”；也包括着搞清楚原句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语法关系。所以帕特里克的难句释义很有价值。培根的语言，不乏晦涩难解之处，所以我在翻译此书时，除了将帕特里克的本子中已有的释义作为注释译出外，也针对个别费解的句子，有关其言外之意，在注释中加上了我个人的理解，提供给读者参考。

帕特里克在注释中，还指出了在个别地方培根在用典上的“张冠李戴”的错误，当然古人写书，使事用典难免有误，但如果如果不指出来，便或者会以讹传讹，或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在“论表面上的聪明”一文中，培根把原是昆提利安说的话，当成盖利厄斯说的话，当然这并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不过当然还是搞清楚为好。但“论爱情”中的一个误记，却是必须予以纠正。文中说，伟大的人物能把爱情这种软弱的激情拒之门外，不过马可·安东尼和亚璧·克劳狄不在此列，接着又说，亚璧是严肃而明智的人。安东尼好理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又因为迷恋埃及艳后而兵败身亡，这是无人不晓的故事。但亚璧就令人费解了，他既然“严肃明智”，又怎会有安东尼那种软弱的激情？帕特里克的注释令我豁然开朗。这儿是培根把两个亚璧混淆了，那个贪恋女色的亚璧是亚璧·克劳狄，姓克劳狄，而那个严肃明智的亚璧是亚璧·克劳狄·凯西斯，姓凯西斯，中间的那个克劳狄是他的“中名”，即第一个名字与姓之间的那个名字，培根是误把“中名”当成姓了。

这两个选本，是编者对培根论说文的研究成果。著书的人，往往在序言的最后特表志谢 (acknowledgements)；我只是译者，但我也想向这两本书的编者里斯和帕特里克，以及为前一种书写了导论的斯米顿，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不得力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是译不出此书的。

在我国，前辈学者在培根的论说文的翻译和研究上，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提到培根，人们就立即想到王佐良先生译的“谈读书”（即本译本中的“论学业”）一文，此文已成为我

国学者翻译外国散文的珍品。培根的原文写得精彩，王佐良先生的译文也译得精彩，致使自60年代一问世起，便不脛而走，一时洛阳纸贵。时至今日，大家对“谈读书”中的不少话语仍耳熟能详，引用起来如数家珍——一篇好的译文就是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我相信，王佐良先生所译出的“谈读书”，还将会继续影响一代代的读者。

就我所知，除“谈读书”外，王佐良先生还译有“谈美”和“谈高位”两篇（见王佐良著，《英国诗文选译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年版），都是用文言译出的。我对培根的认识，应该说是从王佐良先生所译的那几篇文章和所作的相关论述中开始的。有关这几篇文章的翻译，王佐良先生回忆道，“那一次我考虑了一个技术问题：培根在《随笔》中用了十分简约的文体，而且文章写在十六七世纪，字句都有古奥处，应该用什么样的中文来译它？最后我决定用浅近文言，因为文言容易做到言简意赅。我是一个完全从‘洋学堂’出身的人，文言是后来自学的，不地道，幸亏稿子送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得到了朱海观同志的润色，才成了后来出版的那个样子。”（见王佐良著，《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我之所以引用这一段话，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培根的文体特点，同时也可从中看到王佐良先生尊重他人劳动的学者风范。我在翻译本书的时候，参考了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深感受益匪浅，我应该向王佐良先生和朱海观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王佐良先生所用的“随笔”一词，与本译本所用的“论说

文”，在原文自然是同一个字，即 Essays。译名的不同，只不过是翻译者的选择的问题，无关弘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蒙田，先于培根即出了一部传世名著，书名是同一个字，Essais，我国通译为《随笔集》。在字典中，essay 可意为“论说文、散文、随笔、小品文”。按照钟敬文先生的定义，论说文和随笔都可归类于议论性散文。钟敬文先生的原话是，“现代散文范围还是较宽泛的。议论性散文（政论文、学术文、杂文、随笔等），……”（见《中国散文精典》总序，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我本人以为，译为“随笔”，则更能传神，但译为“论说文”，则更合本书的总体体例。但我本人自然没有那个学力给它起一个两全其美的名字了，两相比较，还是选择了“论说文”这个释义。

我尤其应该向水天同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据我所知，水天同先生是我国译出培根的论说文集全文的第一人。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水天同先生译的《培根论说文集》。从版权页上看，此书1958年出了第一版，1983年出了第二版，1986年为第五次印刷。在书中所附1957年写的“重版弁言”上，水天同先生说：“译稿成于1939年，至1950年始获刊行。”由此可见，初稿译成至今，已有六七十年的光阴；单是从1950年初次出版，到1983年的第二版，也就是修订版，中间也有33年的跨度。而从翻译的角度看，从1939年译成（那当然是在39年以前译成的），到1983年最后修订，中间也有四五十年历程。可以说，水天同先生在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把毕生的经历都献给了对培根的这本论说文集的翻译。

几十年译一本书，岂非天方夜谭？那得看是什么书。当然水天同先生不会几十年整天译这本书，但1950年初版以前必然会对1939年的译稿予以修订，1958年出版前必然会对初版予以修订，1983年又一次修订，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培根的这本书，从初版的1597年，到1625年他去世前的第三个版本，中间他不断地增删修改，可以说是写了30年，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以其多方面的难度，是值得反复揣摩、一再修订的。“歌德写作《浮士德》，从狂飙突进时期起到他逝世前一年完成，延续了将近60年。……它与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见冯至先生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歌德”条目）。可见写一本书，甚至译一本书，花费上几十年的心血，决非夸张。我在译此书的时候，参考了水天同先生的译本，感觉就像学生向老师求教一般。坦率地讲，如果没有水天同先生的译本作参考，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把这本书译出来。

一般译书，是不必在译序中把所使用的工具书列出来的。但这本书情况不同。这本书涉及面之广，没有相应的工具书那是根本不可能译出的。除了一般常用的工具书外，如百科全书，辛华编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和《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译文学作品所必须参考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以及译本书所必不可缺的中文版《圣经》之外，我尤其得益于以下几本，我是满怀感激和崇敬之情提到它们和它们的编纂者的。

一是陆谷孙先生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这本词典在释义上的精确、详尽，自是有口皆碑，而且它

还是一本包罗宏富的简明百科全书；不仅宏富，而且精确。培根的这本书用典甚多，就译文看，个别篇目的注释甚至可占整个篇幅的一半。大多数专名术语，在《英汉大词典》中都可查到，大大地方便了译者的理解和翻译。我认为，这本《英汉大词典》是最好的一部大词典，它是百余学者、历时十数年编纂而成的。他们堪称中国的七十子。（所谓七十子，就是公元前3~2世纪时，在亚历山大城通力协作，将《旧约》的希伯来原本译成希腊文的72位犹太学者，该译本称《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

再就是欧文·沃森（Owen Watson）编纂的《朗曼现代英语词典》（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1976年英格兰版）。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词典。一般的典故专名，如恺撒、安东尼，自是照抄《英汉大词典》上的解释即可。但有的用典，则须与英语原文工具书相核对后，方可感到放心。《朗曼现代英语词典》就起到了这个作用。不仅如此，也有若干个专名，在《英汉大词典》上查不到，在《朗曼现代英语词典》中却可查到，这又补足了《英汉大词典》之不足。当然，词典各有侧重，这一点自不用我来多作解释。

由于培根是十六七世纪时的人，他的文章又大量涉及到在他之前直达人类文明初年的专名，因而专门性的工具书也就成为必需。伦普里尔（J. Lempriere D. D.）所编纂的《古典辞典》（A Classical Dictionary Containing a Copious Account of All the Proper Names Mentioned in Ancient Authors, 伦敦1919年版）就是这样一本必需的工具书，如书名所示，这本辞书对古典作

者所提及的所有的专名，均作了翔实的陈述。没有这本辞书，培根的这本文集的翻译就是难以想象的。

兹举一例。在“论反叛与动乱”中，培根说：“当悲伤和灾祸飞出来的时候，埃辟米修斯终于合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了盒子的底下。”这里所用的，就是无人不晓的潘多拉的盒子的典故。有关潘多拉的盒子，《英汉大词典》释义为：“潘多拉的盒子（内装各种灾难和祸患，被潘多拉私自打开）”。这就与培根的说法相抵触。查了伦普里尔的《古典辞典》，问题就迎刃而解。综合《英汉大词典》有关潘多拉本人的条目、《朗曼现代英语词典》和《古典辞典》，我们就可讲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儿盗取天火给了人类。主神宙斯命火神赫菲斯托斯用黏土做成了潘多拉，她是第一个女人；宙斯派潘多拉下凡，为的是对普罗米修斯所犯下的这个罪进行惩罚。宙斯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其特点是，一打开它，它就会释放出人类的一切灾难，但“希望”却待在盒子的底下，以安慰人类。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辟米修斯轻率地娶了潘多拉为妻，他由于好奇，而打开了潘多拉带来的那个盒子，盒子里随即飞出了一连串的灾难和祸患，从那一刻起，那些灾难和祸患便折磨着人类，从未停止。这就是宙斯所作出的惩罚。所幸的是，“希望”是唯一待在盒子底下的东西，因为在埃辟米修斯终于把盒子盖上以前，“希望”还没有来得及从盒子里逃脱。所以说，人类始终保留着希望。

前辈学者对培根所作的研究，也对本书的翻译多有启发。杨周翰先生说：“我们读培根的作品，总发现他爱连用两个词

来表达一个概念。”（杨周翰著，《英国十七世纪文学》，北京大学1985年版，第13页）表达同一个概念的两个词，自然是意义相近的词，或者笼统地说是同义词。杨周翰先生的这句话，给了我一把理解培根作品的钥匙。例如，在“论嫉妒”中有一句话，“而且嫉妒总是由于传闻和谣言而得以强化。”这儿的“传闻和谣言”，原文是“speech and fame”，按照现代英语，speech自然意为言语，fame意为名声。但言语和名声不是近义词，按照培根的用词规律，译为“言语和名声”自然就会与培根的原意有差距。万人丛书版的“注释词表”里说明，fame可意为“谣言”，这本文集最后所附的一篇文章片断，题目就是“Of Fame”，即“论谣言”。译为谣言是正确的；经查《英汉大词典》，speech的古义就是传闻，传闻与谣言是近义词，因而这儿译为“传闻和谣言”，应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是怀着深深的钦敬之情，提到了上述中外学术界前辈的名字。他们为人类的学术积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我是在汲取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之后，才有可能将这个译本奉献给读者朋友。牛顿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如果说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不敢说我“看得更远”，我自知我的学力与前辈学者无法比拟；但就一本书的翻译而言，我以一个学生的态度，毕恭毕敬地请教了中外学术界前辈的著作，则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得益于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的条件下，为读者朋友奉献出一个尽可能完美的译本，是吾辈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此，才谈得上学术的薪火承传。

二、培根和他的《论说文集》

提起培根，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见于他的《宗教沉思录》中的“论异端邪说”一文。几百年来，这句话不知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多少人。其实培根还有一句名言，我认为人类更应牢记。在其《新工具》中的“语录第129”中，培根说，“Nature is only to be commanded by obeying her.”钱钟书先生用古文译为，“非服从自然，则不能使令自然。”（钱钟书著，《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2页。）译得是不能再精彩了，我读到这句译文时不禁拍案叫绝。仿钱钟书先生的译文句式，这句话似可用白话文译为，“非服从自然，则不能掌握自然。”我以为，这句话今天读来，更有振聋发聩的力量。现在在我们这个地球村上，环境失调，资源枯竭，并由此而引发了种种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服从自然。我以为，单是为了“非服从自然，则不能掌握自然”这一句话，人类也应该世世代代永远感激培根。

对于培根，我国前辈学者已作了精深的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术功力和学术成就，不是我一个以翻译为主的后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一生执教，职业习惯使我不论谈到什么，都惟恐讲不清楚；我也深知为师之道的第一大忌，就是误人子弟。因而为求精确，我在探讨问题时大量引用了前辈学者的权威性论

述，特向各位前辈学者深表谢意。

先谈培根其人。从斯米顿的“导论”中可以看出，培根一生在宦海中浮沉，既有政绩，也有污点，既投机钻营、曾显赫一时，也焦头烂额、身败名裂。英国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在其哲理诗《人论》（Essay on Man）中说：“你若爱才，那么就想一想，培根曾经是多么才华照人吧，/他是人类中最有智慧、最光辉、最卑鄙的一个。”说培根“最有智慧”，似乎有点绝对，是文学语言；但说他“最卑鄙”，则是在骂他，实在是言重了。

培根的一些做法确实不可取，所以也历来为人们所诟病。但当时马基雅维利主义大行其道，即为达政治目的可不择手段，培根本人就深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相信当时像培根一样“失足”者，恐怕不止他一人。其实，培根本人已就对官场当中的勾心斗角感到疲惫不堪。在“论高位”一文中，他就说道：“职位的升迁是费力的，而人们吃尽了辛苦，却又获得了更大的辛苦；职位的升迁有时是可鄙的，人们是通过有失尊严的手段而成了显要贵人。”倘若培根没有那些惨痛的教训、痛切的体会，这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恐怕他就根本写不出来，或者即使写了也不会那么深刻。

有关培根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关系，杨周翰先生有精辟的论述。培根曾写过一部《散记》（Commentarius Solutus, 1608），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杨周翰先生指出，“为了实际，可以不顾一般的所谓道德，不择手段，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在培根出生前30年就已经由马基维里

(按：即马基雅维利)理论化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6页)

本文无意全面评价培根在为政方面的功过——那应该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过如果仿蒲伯的做法、用文学语言来形容培根的话，倒不如把他比做浮士德似的人，也就是贪得无厌地追求知识和权力的人。

当然，最科学的看法，是把他看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人文主义者。所谓人文主义，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说，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转引自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121页)培根就是这样一位巨人。

培根是人文主义在哲学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米顿在“导论”中援引了麦考利的话，说培根离开剑桥大学的时候，“他对让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耗费了才智的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怀有一种有理由的鄙视，而且对亚里士多德本人也决非毕恭毕敬”。朱光潜先生的论述，可以说是对麦考利的话作出了解释。朱光潜先生说，“由于重视观察和实验，培根攻击长期统治西方的亚理斯多德(即亚里士多德)的偏重演绎法的形式逻辑，指出由个别事例上升到一般原则的归纳法更有助于科学发明”。(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20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称培根为“英国唯物